

中国近代史学史

(修订本)» 下

吴 泽 主编

桂遵义 袁英光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中国近代史学史

(修订本) >> 

吴 泽 主编

桂遵义 袁英光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吴泽 主编 桂遵义 袁英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8725-2

I. ①中… II. ①吴…②桂…③袁… III. ①史学史—中国—近代

IV. ①K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132 号

中国近代史学史(修订本)

ZHONGGUO JINDAI SHIXUESHI

吴泽 主编 桂遵义 袁英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7.75 字数:660 千字

ISBN 978-7-01-008725-2 定价:9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下册目录

第二编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至义和团 运动时期的史学(1865—1901)

第一章 洋务派史学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兴起	(293)
第一节 洋务派史学	(294)
第二节 王韬对普鲁士、法国和日本史的研究	(306)
第三节 郑观应的史学思想	(314)
第四节 黄遵宪与日本史研究	(329)
第五节 严复前期史学思想	(340)
第六节 康有为前期史学思想	(351)
第七节 梁启超建立“新史学”的理论	(362)
第二章 封建正统史学	(387)
第一节 王先谦史学	(388)
第二节 叶德辉史学	(403)

第三节 缪荃孙史学	(412)
第三章 正统考据派的历史地理研究和蒙元史研究	(439)
第一节 杨守敬和历史地理研究	(440)
第二节 丁谦的西北历史地理研究	(446)
第三节 洪钧的元史研究	(453)

第三编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至五四运动 时期的史学(1902—1919)

第一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发展和衰落	(467)
第一节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的“三世三重”说历史 渐进论	(468)
第二节 严复的历史自然演进说	(477)
第三节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和特点	(487)
第四节 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501)
第五节 柳诒徵前期史学	(518)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	(530)
第一节 章太炎前期的古史研究和革命民主思想	(531)
第二节 刘师培的革命民主思想与《中国历史 教科书》的编写	(565)
第三节 世界史、革命史的编译和研究	(581)
第三章 正统考据派和改良派的元史研究	(606)
第一节 曾廉的元史研究	(606)
第二节 柯劭忞的元史研究	(616)
第三节 屠寄和蒙元史研究	(624)
第四章 民初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史学	(655)
第一节 章太炎的清史研究和后期史学思想的演变	(655)
第二节 近代通俗史学的兴起	(674)

第三节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	(691)
第四节	封建正统史学的回光返照和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曙光	(728)
后 记		(739)
附 记		(740)

第 二 编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至义和团
运动时期的史学(1865—1901)

第一章

洋务派史学和资产阶级 改良派史学的兴起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清廷统治得以暂时稳定。清廷统治者把这一短暂的稳定,称之为“同治中兴”。所谓“同治中兴”,就是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号召下,兴洋务,向西方学习,开创一些官办军用工业,之后发展为官商合办,出现了一些民族资本工业,但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洋务派“自强”兴政的破产,中国更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兴起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失败,反映在史学上,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洋务史学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洋务派史学是为了洋务派办洋务的需要产生的。如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中国先睡后醒论》,反映了洋务派思想和政治主张。洋务运动的破产,出现了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早期改良主义史学家。他们是从洋务营垒中分化出来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在外国留过学,有的与外国人交往多,有的在英、日、美等中国驻外使馆任

职,对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有所了解,认识到外国长技,不仅在科学技术之类,而主要在政治制度上,他研究西方历史,为开展变法维新提供历史依据。至康有为、严复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史学已初步形成。梁启超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中提出了建立新史学的理论和体系,力求“新史学”与旧史学有所区别,从而使中国近代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一节 洋务派史学

一、王之春与《国朝柔远记》

王之春(1842—?),字爵堂,湖南清泉(今衡阳)人。曾任浙江、广东按察使。光绪十六年(1890)迁湖北布政使。光绪二十年(1894)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四川任布政使时参加镇压余栋起义。次年,擢升山西巡抚,后调任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让出广西矿产权条件,“借法款、法兵”,依靠外国侵略势力的力量镇压广西人民起义,激起人民拒法运动,次年,他被革职。他以文人兼懂一点军事,跻身于洋务派官僚行列。著有《国朝柔远记》、《防海纪略》、《谈瀛录》、《椒生随笔》等。

《国朝柔远记》是王之春治史的代表作。全书共二十卷,系据谕折、中西著述等资料编撰而成。前十八卷按年月顺序记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三年(1874)清朝对外交涉事。附编二卷,记述荷、英、法、美等国势力消长及西方东侵之势,分篇论议约、办校、开矿、团练、禁烟、禁贩奴、防漏税、固边强兵等策。并列《环海总图》、《沿海舆图》、《三岛分图》(琼州、台湾、澎湖)和《天下四海总图》,图后附说,道其地理形势、风俗人情、物力盈缺等。初刻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改名《国朝通商始末记》。该书从内容上看,实为清代外交史。王之春编撰《国朝柔远记》,是利用自己“以文人兼武事,驰驱江海间,防北塘、驻京口、游历日本长崎、横滨,于中外交

涉事见闻周洽”^①等条件,其资料主要是“恭录列圣上谕及颁发官书外,并搜录当时诸臣奏疏与名臣撰述,西人图志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荟萃而成。间有得之闻见者,要必采访确实,不敢稍涉虚诬。”^②可见,他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王之春编撰《国朝柔远记》时,正是洋务运动极盛时期。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购洋船,建水师,自以为北洋海军从此可以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光绪十七年(1891)海军举行大检阅,认为“自强新政”大有起色,洋务派官僚们此时完全沉醉在所谓“同(治)光(绪)中兴”的虚假现象之中。他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和西方列强“和戎”相见,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以保住清廷封建统治地位。因此洋务派官僚们尽力利用封建传统的所谓道义恩泽的屈辱妥协的外交观念,美化清朝的“厚泽深仁”,以所谓“柔远抚夷”的怀柔政策,掩盖他们向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国朝柔远记》正是迎合洋务派官僚们的政治需要而编撰的,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史学的代表作之一。王之春自叙其写作动机,是谓“搜辑陈编,考证往事……就中外交涉之端,详晰编次”的,是为了“欲使善于约束羁縻,或有裨于久安长治”的目的。他为寻找妥协投降政策的历史依据,竟说什么“魏绛和戎,实深沉之至计”,“范文虎舟矜远泛,卒至祸延君国”,企图以中国历史某些“和”“战”事例为“殷鉴”,为洋务派“和戎”妥协投降政策辩护。

《国朝柔远记》以清廷统治为中心,贯彻所谓“立诚信”,“怀柔远”的编纂宗旨,以简练的文笔叙述了清廷二百多年中外交涉的史实,尤详于鸦片战争以后各次交涉事件,其篇幅占全书十一卷之多。该书资料主要来源多为当时皇帝诏谕、官书、奏折及私人撰述,其中不少歪曲粉饰之词,如果认真分析和细加甄核,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供研究近代外交史的参考。

① 彭玉麟:《国朝柔远记·序》。

②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凡例》。

该书虽采辑资料汇编而成,但王之春在叙述中每每发表评论,鲜明地表露了洋务派的立场观点。如记述咸丰十年(1860)九月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屈辱的议和后,为清廷奕訢主持签订北京条约的投降活动加以辩护。他说:“按和议既成,论者每归咎当时王公大臣不肯力争,任洋人之予取予求,致卧榻之侧为他人所鼾睡,不知当时京兵新败于内,援师远穹于外,其平日矢口以忠愤陈说者按手咋舌,不能发一策出一谋,甚或逃匿不暇。恭亲王以天潢之胄,躬捍大难,屹然不摇,虽迭蒙行在密旨,趣其沪辍,而以社稷为重,不动声色,力持大体。既杜其无覆之要求,卒能委曲成和,此其所保全者大而其所设施者远也。执事后之议论以譬局中之艰危,乌乎可哉!”^①他还特别为曾国藩涂脂抹粉,当北京被攻危急时,咸丰帝将胜保请飞召外援折抄给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率军迅速北援,但曾国藩却建议咸丰帝“俟该夷就抚”,不愿出兵,经咸丰帝再三催促,他才提出北援议八条,让处于燃眉之急的咸丰帝去“圣裁”。这本是“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②的问题,但王之春却为北援议八条吹嘘说:“按英人连兵各国乘虚内犯,原恃我东南未靖,故敢妄肆披猖。当时若阳以和议与之羁縻而待外省援师,戮力歼剿,翠华北狩,狐鼠无城社之凭,义旅南来,虎狼入围阱之内,纵不能聚而歼之,其能不俯首帖耳以听命于我哉?上欲以诚信待外洋,且不忍生民之涂炭,既允和议,即止援兵,固足以昭复载之仁,毋亦运会所开,欲使中外一家,以辟数千载未有之创局耶?”这样笔锋一转,把对外妥协投降的罪责都统统推到咸丰帝的身上。王之春在叙天津教案事件时,也为曾国藩开脱而诿罪责于崇厚。因为王之春编撰该书时,崇厚正以伊犁交涉中出卖民族国家权益为国人所谴责,是无人替他辩护的。记同治元年(1862)招募洋将授华尔以官职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史实时,完全暴露了王之春的洋务派立场,他说:

英法两国自换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孚。此次上海帮同剿

^{①②}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4,第18—19页。

“贼”，具见真意为好，克尽友邦之谊。著传旨嘉奖并嗣后如有外国协同助剿之处，著薛焕督随时迅速具奏，以章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

王之春还极力表彰镇压太平军的华尔所组织的“常胜军”，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行径。可以说，王之春这部外交史基本上是反映了洋务派的思想路线。

王之春所谓究心于当世之务，编写《国朝柔远记》，完全是出于统治集团兴办洋务的需要。他在附卷十九《瀛海各国统考》中叙述荷兰、英、法、美等国的势力消长及西方东侵之势。并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外关系时，提出了“欲保中外之和局”的所谓“可以强兵、可以富国、可以兴利、可以除害”的《蠡测厄言》十三篇：慎约议、联与国、广学校、精艺术、固边圉、修船政、兴矿利、防漏税、强兵力、练民团、禁贩奴、编教民、论鸦片等。在这些篇章中，集中阐发了他的洋务思想。当然，其中也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某些要求。如在《慎约议》中，王之春在大量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在外国侵略者武力压迫下所签订的中外和约，使国家民族“受损害多，往往有出乎地球公法之外者”，主张在条约期满后应进行修改，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以军功例鼓励在官厂订购商船出洋贸易等，这仍是反映洋务派的主张。在《联与国》中，王之春赞同“以夷制夷”和联合结盟的洋务派外交政策。他用中国历史分裂和统一时期的历史现象，比作当时中国与外国侵略者“和”“战”关系为其洋务派联合结盟等妥协投降政策说教立论。他说：“秦之所以兼并者远交而近攻，蜀之所以抗魏者联吴而释怨，多助者强，寡助者弱。”明确指出：“俄人狡诈强悍”，“久视我为弱肉，而不能为我用者也。”对日本也作了近于事实的分析，认为“日人短小精悍，性情坚僻”，近年来，“有得进步之势，此亦不能为我所用者也”，认为“日之不敢逞志于我者，恐俄之乘其虚也。俄之不敢逞志于我者，恐德之蹶其后也。”他对美国的看法，认为“美国志在通商”，出于自己的利益要求，曾遏制日本侵占琉球，“亦为我用矣”。他对世界形势作上述分析后，在对外策略

上,他认为:“中国欲驱日人而制俄人,首宜交德次宜交美。”“法人因畏俄,不敢结俄,而其心未尝不嫉俄也”,但中国“欲牵制俄人,不得不与羁縻”。王之春虽然看到列强之间矛盾,其中有些见解也不无道理,但他看不清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一致性,列强不会为我所用,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因此洋务派“和戎”策略是不可实现的。

在《广学校》、《精艺术》、《修船政》、《兴矿利》、《防漏税》等篇章中,王之春反对顽固派的守旧言论,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了一整套洋务派的救时急务。在《广学校》篇中,他说:“方今海防孔亟……正宜培养人才,攻彼之盾,即藉彼之矛。谁谓西学可以废哉。”并且指出清廷当时所举行的武科考试,只以骑射技勇见长,而不懂现代武器的使用,不懂现代的武器。是太落后了,不适于用。因此,他建议武科设三等考试之,一试以山川形势进退之方,二试以算学机器制造之能,三试以测量枪炮高低之度。在派出国学习的留学生问题上,他担心青少年出国学习之后,“愈染而愈失其本来,尽弃其学而学,恐尽变于夷者也。”因为洋务派提倡的是学点西方的技术,而不能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所谓“西学”就是制造船炮、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技术以及商务、对外贸易、万国公法等,“中学”就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明确提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榛狉之俗,所以致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之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把“中学”看作是治国兴邦的基础,“西学”不过是一种救急和治标的方法。“西学”在洋务派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仅仅是用来巩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而王之春认为与其多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不如在国内广开学校,译西国有用之书,请精于泰西之学者任教师,俟学生学成之后再派赴外国大书院学习或直接参加洋务。在王之春看来,“西人之所长者技艺耳”,由于中国“执行不精,故让他人之我先耳”。一方面,他主张中国应该

自己设立军火工厂制造机器轮船,强调“自强之机,自固之术胥于此矣。”并且吹嘘说:“自闽沪设立船厂以来”,是所谓“成效益彰”;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些官办军事工业对外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出现了“彼为我用,而我实为彼用也”的现象。他企图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甚至担心“诸外国一旦有事,群起而为闭粲之谋”的再现。他还提出了开煤矿、铁矿的建议,以济当时轮船之需;主张去厘金而增加关税,以便“寓强于富”。在《强兵力》篇中,他要求清廷实行曾国藩式的改立练勇,组成湘军式的军队,以增强政府的兵力,明确指出:“洋人之所畏者不在中国之官,而在中国之民,则何弗因其所畏而为未雨之绸缪耶”,因而他极力主张练民团。

该书附卷二十《沿海形势略》,鉴于鸦片战争之后,海氛日炽的形势,他论述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地形势险恶。并附《环海全图》、《沿海舆图》、《三岛(台湾、澎湖、琼州)分图》和《天下四海总图》等,“以备披图便览”。王之春在凡例中提出:“各直省沿海疆界岛屿与前人虽间有图绘,恒苦略而不详”,为了纠正这一缺陷,故他“详细绘列,著为图说”。上述图说反映了王之春对海防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在资料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朝柔远记》颇为清统治集团中一些人所重视,并大肆吹嘘渲染,如李元度在“序”中说,该书“欲使尧舜孔孟之教,自中国以施及蛮貊”,其中《卮言十三篇》,“皆时务切要之言”。彭玉麟也在“序”中称赞王之春“见闻周洽,暇则博稽”,“弹岁月之功,成为是书,诚抚远之宏图,缓远之良策也。”卫荣光在“序”中认为该书较之近时《朔方备乘》、《瀛环志略》诸编,更切合“经世之实用”。统治集团中有些人之所以如此吹捧该书,主要是由于该书反映了洋务派的思想,适应了他们的要求。

二、曾纪泽与《使西日记》、《中国先睡后醒论》的编撰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同治九年(1870)由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父忧服除,袭

侯爵。光绪四年(1878)出任驻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后转大理寺少卿。光绪六年(1879)使俄大臣崇厚因与沙俄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曾纪泽遂被委任兼充驻俄大臣,赴俄交涉修改《里瓦几亚条约》,次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旋授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法战争期间,疏陈备御六策,主张抗法。由左宗棠举荐,光绪十年(1884)擢兵部右侍郎,赴英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岁增入银二百余万两。回国后,调任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继后调任户部左侍郎及管理同文馆事务。卒谥惠敏。著作有《曾惠敏公遗集》,该书于光绪十九年(1893)刊刻。共十七卷,分奏议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四大部分。奏议起自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迄于光绪十五年八月(1889年9月),主要是关于与沙皇俄国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内容。《使西日记》起自光绪四年(1878),迄于光绪十二年(1886)。该书中所辑奏议、日记等涉及中俄、中西交涉事甚多,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曾纪泽受其父曾国藩影响,成为湘系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受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影响,不满地主阶级顽固派拒绝学习西方的思想,表现了他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坚持封建统治者“尊严”的洋务思想。他说:“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洁之论,守其所知,拒其所未闻。若曰: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非六经典籍之所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赅备古今万世之器与名,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慨然持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①他又强调:“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狙佞之间,诗书礼义无焉,唯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

① 曾纪泽:《曾惠敏公全集·文集》卷2《文法举隅序》。

于国事，亦相侔耳。”^①可见，他的思想与洋务派首脑人物曾国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既主张学习西学之长技，又要根固传统儒学，维护清廷封建统治。《使西日记》和《中国先睡后醒论》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曾纪泽的洋务史学思想。

《使西日记》记载了曾纪泽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十一年（1885）出任驻英、法大臣兼驻俄大臣期间的外交活动。该书值得重视之处，一方面记录了洋务派关于同外国交涉，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和看法；另一方面记叙了和顽固派在内政外交上的分歧和争论。他出使英、法、俄等国时，正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之时。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弱国无外交”的局势，但曾纪泽以他精明干练的才气，主张办外交、遣使节，是为了以“折冲樽俎”的外交手段，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他提出向西方学习，认为“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曾言，学者得以比例而评鹭之。其饮食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之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言语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②然而曾纪泽学习西学，学习英文，奉使出国，却受到了顽固派“清议”的排挤，反对他学西学的主张。他对顽固派“清议”言论，尖锐地予以反驳。他说：

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硜硜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搏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

^① 曾纪泽：《曾惠敏公全集·文集》卷2《文法举隅序》。

^② 曾纪泽：《使西日记》。